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斋名溯源——代序

我本无斋，何来斋名？乃因这套丛书统一命名《×××（斋名）笔记》，聊以虚应故事罢了。

可能有人怀疑，读书人岂能无书斋？殊不知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书斋的读书人多矣哉！在下即曾长期为其中一分子。忆往昔，两代人挤住一室，或一室半，或无厅且共用厨房厕所之两小室，内人为保证两位千金做作业，常以缝纫机代替书桌，又有多少空间可以布置书房？“文革”期间沦为重点批斗对象，大批书籍或毁于火，或半卖半送给旧书店，仅奉命搬家即拖走两大板车。近阅《堪隐斋随笔》，始知嗜书如命的谢兴尧前辈亦有类似遭遇，伤哉！

直至1980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以外国学者来访者渐多，得以“破格”住进四室一厅的教授楼。虽然是高踞夏天奇热冬季酷寒的顶层，已成全校众多同事羡慕不已乃至略有烦言之对象。全家喜出望外，仿佛一步登天。妻子怜我历经磨难，慨然留大房一间，摆满书架，俨然书斋。书籍扬眉吐气，主人握笔欣然；思如泉涌，文似天成，其乐无穷。然而好景不常，斋名尚未拟就，忽膺校长之选。书房顿时成为办公室之外延，或可称之为全天候的接待室，电话铃声频起，不速之客常来，书且难读，遑论斋名？曾忆蔡元培先生所言：我本来是个可以做点学问的人，却从未想到会当大学校长，每天要见许多不愿见的人，要说许多不愿说的话……。而现今大学校长之难当，较之五四时期更有甚焉！

岁月如流，又复蹉跎六年。幸而上级念我迟暮，允许辞去校职，得以重操故业。自1990年起，先后在美、日、台、港各大学，或任教，或研究，历时已逾四年。海外萍踪，飘泊无定，虽有伏案笔耕之所，毫无书斋归属之感。且海外高校教授备课室，一概称为office（办公室），连辅导学生时间亦称office time。室内电话、电脑一应俱全，上班下班与行政职员无异，所以很难认同为传统的读书撰述之所。

1995年夏，行云野鹤，重返故园。不久又有幸迁入学校新盖的“博导楼”，由于已属资深行列，得免“顶天立地”之憾。贤妻慷慨如故，仍为我留南向大房一间，且配以一色书架，气派更甚于前。但由于中外、两岸学术交流日多，新书增添过速，虽挖尽潜力亦难以容纳于一室。于是只有为书籍扩张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无空不入，连小孙女的闺房亦未能幸免。妻虽贤淑，亦有怨言：“你的书把全家最好的空间都占了。”反躬自省，颇觉内疚。过去把大批书籍堆置于床下柜顶，那是人对不起书；如今书多成灾，无限扩张空间，实乃书对不起人。平心而论，书籍固应珍惜，家人亦当爱护。为了正确处理人书之间关系，急忙把一大批书刊运往历史研究所为我保留的办公室。此室宽敞明亮，俯瞰南湖，远眺云天，景色尤甚于寒舍。一介书生，坐拥两间书屋，神游古今中外，情驰天上人间，富贵尊荣于我何足道哉！

然而几经冥想苦思，斋名缺失依旧，其原因似在于自己有思想障碍。长期以来，我对书斋一词陈义过高：专属于己，此其一；功能单一，此其二；品位较高，此其三；主人醇雅，此其四。时至今日，前两条虽已具备，后两条则尚未入流。藏书虽多，但较杂乱，且乏珍本。至于主人，既乏师承之薪传，更无家学之余韵；治学已难大成，岂敢附庸风雅。是

以踌躇再三，斋名未定如故。此书之所以取名《实斋笔记》，无非遵从丛书体例，与群贤保持一致，非敢有所志得意满也。

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字实斋，他是浙江会稽人，我则源于浙江湖州荻溪章氏一系，因此决无冒充名牌促销此书之意。我之取名实斋，乃是借用荻溪章氏第十二世祖节文公的斋名。节文公字实庵，曾在山西做过地方官多年，老家曾藏有林则徐书赠给他的对联和条幅。我至今还保存他的两方印章，一牙质，曰“实斋”；一水晶，曰“率真”。荻溪清芬堂章家这位老实斋（第十二世）与我这个“小实斋”（第十七世）相距约150年，手头虽有一本《浙江湖州荻溪章氏家乘补编》，但过于详近略远，自第十四世以上皆语焉不详，故不知节文公人品与政绩如何，是清官还是贪官？我借用其斋名只是由于欢喜这个实字，随手拈来，懒得动脑筋而已，与彰显祖德毫无关系。对我来说，实即诚实、朴实、扎实，别无其他深奥之意。实是做人治学的根本，应奉为一生言行准则。“东方时空”把一个节目命名为“实话实说”，大约也有此意。但当今之世要做到实字谈何容易，即使中央电视台经常标榜：“东方时空真诚面对群众”，似亦未必能够赢得全体国人的共识。不过有此承诺总比没有好，我就经常欢喜倾听这句字正腔圆的开场白，因为它至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要诚实。

或曰借用祖先斋名岂非犯讳？我则认为这种陈规旧矩早就应该废除。君不见英国皇室从不避讳与先世同名，如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之类。即使一般西方平民，大卫、查理、詹姆士等等，也往往好多世代轮番使用。例如解放前颇有名气的基督教中国内地会，其创始人戴德生，英文名字为 James Hudson Taylor。我与他的曾孙戴绍曾为同龄好友，其实这位小戴的英文名字与老戴德生就完全相同。说到底，名字无非是一个符号，本人究竟是什么角色，全凭自己去创造，当然也有待于他人评判与历史检验。

似乎越扯越远，但也不算多余。交代斋名来自何处，以示不敢掠先人之美，更不愿借前贤之光，正是为了力求做到一个实字。

即以此为序。

章开沅

97 香港回归年之暮春于实斋

编者前言

这是一套由我国现当代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笔记丛书，可供学界、知识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研究学习、阅读欣赏，以丰富学养，增广见闻。

笔记是我国传统的文体之一。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学术笔记层出不穷，代表作如汉应劭《风俗通义》、宋沈括《梦溪笔谈》、清赵翼《陔馀丛考》，皆极具考据、辨证价值。笔记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名物、释语辞、述史事、写情景等。其特点是，偶有心得，随笔记录，虽零星琐碎而不忌，题材广泛，上天入地，虽散漫驳杂亦不厌。由于文章短小，却多新意，内容不拘，而涉猎广阔，自古以来，颇受世人重视。然而多年来，学界已养成好发宏论的风气，一个论点，一个新题，不动笔则已，动笔则万言十万言，似乎不成论文、专著，不足以讲清道理，以致鸿篇巨制满眼，遂有灾梨祸枣之讥。为纠此偏，今特编纂一套“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以发扬笔记在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积极作用。

学人笔记，多累积经年，小玃片玉，埋没可惜，能摭拾汇为一札，公之于世，诚学界之幸事。至于有的已作为单篇发表者，贵其能独出机杼，别具手眼，亦酌情周纳，以增本丛书光彩。

本丛书在编纂过程中，承蒙作者大力支持合作，谨在此深致谢忱。

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8月

卷一 历史寻踪

1

我的家庭历史

我的老家在安徽芜湖青弋江畔。童年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只记得对岸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每到春季油菜花开，触眼是灿烂的金黄，与岸边绿色的垂柳相映成趣。

但家里的人们从来都把自己的籍贯填报为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至今连我们兄弟的下一代亦复如此。我从小流浪在外，对家族历史了解甚少。幸好大哥作为长房长孙，还保存着一本《吴兴荻溪章氏家乘补编》（1944年版），才使我粗略地获知自己的家世渊源。

荻溪亦称荻港，因水中芦苇丛生、无边无际而得名。聚族而居的章氏最初似乎没有什么显赫的祖先。一世祖、二世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二世祖的牌位上“题曰处士”，可能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三世到五世均系一脉单传，直至六世才算有了兄弟三人。自此人丁逐渐繁衍，从九世开始分成若干祠堂，我家属于清芬堂。荻港地少人多，出外谋生者渐众，尤以经商、游幕者为多，我家先人大概就是游于业幕而侨居外省。

据文献和实物可考者，从我们的十二世祖实庵公开始才进入仕途，成为官僚世家。实庵公在晋、陕两省做过知府或道台之类官员，家中曾长期保存着林则徐书赠给他的条幅和对联，可惜焚毁于“文革”中“扫四旧”之际。十三世祖怡棠公亦曾任地方官员并一度入左宗棠幕府，以前老家曾存有他手书的诗词结集，但早已无可查寻。大约正是由于怡棠公的渊源，十四世祖干臣公（我的曾祖）少年从戎。于光绪二年（1876）以监生报捐州同身分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于新疆南北两路。1880年以军功补知州，并在左营经办哈密屯防。西征结束后，历任安徽抚署文案、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安徽首县）知县等职。

干臣公是我们家人心目中的英雄。其实他的仕途并非得意，后来在宣城任内，因上级对当地“教案”肇事民众处分过重，愤而辞职。甲午战后转而投身实业，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下海”。1896年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工厂，正式开工比南通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还早两年。嗣后他又在安徽当涂以新法开采凹山铁矿，并在上海设立宝兴铁矿公司。宝兴铁矿有自己的铁路和码头，矿石主要是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堪称是今日马钢的前身。干臣公进取心很强，晚年还曾与开滦公司协议合办开平煤矿（我的大哥即以开平为名），不幸在1920年初因病早逝。此后家人不善经营，加以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巧取豪夺，两家公司先后被政府“劫收”域宣告破产。

及至我出生之日，家道已逐渐中落，我并未看到先辈当年的辉煌。

1995年年初，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名义邀我前往讲学。为满足许多友人的要求，我在一次全院师生参加的周会上，作了题为“历史寻踪”的讲演，概略地介绍了我的家世和学术生涯。由于许多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据该院李院长说大概只有30%的人真正了解演讲的内容。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自己动手把讲话稿整理成为文章。今分篇收入本卷中。

我之所以追忆往事，无非是因为这种家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两点影响。一是由于干臣公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样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记得1963年秋天，我们学校的老院长杨东莼先生，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把我借调进京，协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并指派我经常与章士钊（行严）先生联络。他在带我去史家胡同章府初次拜会之前，曾悄悄问我：“你与行老有无宗亲关系。”我说：“没有。他是湖南人，我是浙江人。不过我的堂伯章宗祥倒是与他有北洋同寅之雅。”东老非常高兴，连忙嘱咐我说：“很好，老辈人特别重视世谊，这样便于你和行老深入交谈。当然，章宗祥名声不好，但你不必有所顾虑，万一引起什么麻烦，由我负责。”那时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调响彻云霄的年代，所以东老才作如此似乎是多余的解释。果然，行老见到我倍加亲切，待我以世交子弟情谊。事后他曾对夫人吴弱男说：“我见到仲和（章宗祥的字）后人，人品，学问都好。”其实我属清芬堂一支，章宗祥属振麟堂一支，并非很近血缘关系。但总算因为这点宗族渊源，行老对我撰写张謇传稿颇为关心，在我一部分张氏未刊信札笺注上作了认真的批注和订正。至于其他历史人物或其后裔为我提供的资料等多方面帮助，这里就不必一一缕述了。

2

我的学术生涯

我有幸成为一个历史学者，或多或少出于偶然。

中学时代，酷爱文学，勤练写作，由于牢骚太甚，语多冷峭，同学间有以“小鲁迅”相称者。我虽不敢有此非分之想，但确实很想将来成为一个文学家。

大学时代，虽然在历史系读书，但并未树立此项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以外，爱读文学作品与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并未认真攻读史学经典。记得我们历史系有一个小小的读书会，曾不定期出一个名叫“天南星”的墙报，属于进步学运阵营。我常为这个墙报撰稿，也曾在夜深人静与三五同学悄悄把墙报贴出去。我写的稿件稍有影响者有两篇：一篇是政治讽刺诗，题为《火车抛锚》。此诗摹仿马凡陀（袁水拍）通俗风格，而采用的却是印第安古老歌谣《大白翅》（Big White Wing）的格律，由于内容和形式都比较清新而流传到校外。据说曾有音乐系学生打算为之谱曲，但不知到底谱成没有。另一篇是政治评论，题为《漫话金圆券》。起因是读书会曾为金圆券的发行举办一次小型座谈会，大家认为我的发言比较中肯，便推我执笔撰写此文。记得当时领导读书会的曾宪洛同学，还为我代拟一个“文封湘”（暗寓章开沅）的笔名。墙报贴出后居然招引很多人前来观看，因为金圆券的发行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和国民党政府的前途，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费用。据说连经济系有的师生也很重视这篇文章，到处打听“文封湘”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够运用西方货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剖析刚刚出笼的金圆券

的运作及其前景，而且说理还比较切中要害。其实连历史系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在进入金大以前，曾经读过不到一年的会计大专，多少有点中外经济学、经济史和货币学之类的底子。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当然都很稚嫩粗疏，但说明我很早就有钻研社会科学的兴趣，不过却从来未曾想过要研究历史。当时我的志愿是当一名记者，特别是战地记者，那才是充满挑战的够刺激的职业。

1948年冬天，如同千千万万进步学生一样，我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本想当个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却不料被中原大学校方看好我这个三心二意的“理论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建立不解之缘。以后中原大学随军南下，我又隶属于该校新创办的教育学院历史系。1951年秋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以后正式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我便在这个学校的历史系教了一辈子中国近现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者，确实是心口如一地献身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当然革命也不容许个人有自己独立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常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应该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是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

1954年以前主要是应付教学，试想，一个只读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要独立地为大学本科生，甚至为在职中学历史教师（有些人相当于我父亲的年龄）开课，而且经常是每周3门课、13个课时，那是多么勉为其难。不过，也许是由于我的运气太好，教学从一开始就得到较佳反映，无论是本科生还是比我年长的中学教师，大多乐意听我讲课。这样才逐渐增强继续教学的信心，并挤出一点时间进行若干结合教学需要的课题研究。

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赶潮流，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1960年以后转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0年以前，我发表论文较少，与外地同行学者的联络更少，可以说是僻处乡野，孤陋寡闻。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使我得以聆听一些著名历史学者的教诲，也使我结识外地一批才思敏捷、学有所成的青年隼秀。1963年，承蒙杨东莼先生的关切与提携，经学校同意把我借调到北京，名义上是协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实际上是享受带有进修性质的学术休假。在北京一年多期间，主要是研究张謇，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和原来在南通搜集的《张謇未刊函札》等相关原始资料，对照《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已出版书籍，做系统的史料长编与笺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20多万字的书稿，这就是迟至1986年才经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的原坯。北京之旅使我大开眼界，不仅得以利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丰富藏书，而且得以向许多全国知名的师友经常问难切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北京作为首都，又是一个政治极为敏感和人际关系相当复杂的地区，而我对此毫无察觉。1964年秋天，名为学术讨论而实为政治批判的意识形态讨伐渐形紧锣密鼓，一向谨小慎微的杨东老唯恐我们年少

气盛，有可能以文字惹祸，曾多次说及这些学术讨论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并以自己的老友孙冶方等知名学者受批判为活生生的例证。对于这些好心的劝喻我却漫不经心，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只知道埋头从事张謇研究。不料有天《光明日报》记者突然前来约稿，希望我对戚本禹评论李秀成的文章发表一些意见。我与《光明日报》关系比较密切，而且这位记者与我谈得又很投机，所以便连夜赶出一篇题为《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的文章寄给该报。没过几天《光明日报》就刊登了这篇急就之作，但却在上半版同时刊登了署名任光（即吴传启）的批判文章，直指我是反马克思主义，以折衷主义手法为叛徒辩护。不久，中宣部即通知湖北省委，内定我为重点批判对象，回鄂接受批判，同时通知各地报刊不得发表我的文章。既动员参加学术讨论，又不容许为自己声辩，我这才体会到“学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的厉害，也才体会到东老谆谆告诫的苦口婆心，但一切都为时晚矣！

这种挨批的角色一直延续到1966年，而由于有此前科，我在“文革”中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学术研究随之长期停顿，蹉跎岁月达10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编辑不甘于寂寞，悄悄鼓励我组织两湖与川、黔部分学者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专著，这才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重操旧业。幸好“文革”不久就收场了，《辛亥革命史》编写组的同仁情绪很高，日以继夜地全力投入编写，而且其他各地相关学者也给以许多关切与帮助，这部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终于在1981年10月以前全部出齐，成为对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献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学术界和其他各行业一样，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继合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从1979年秋天开始，我又多次应邀前往美、欧、澳、亚许多国家及地区开会、讲学和访问，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三所大学任教和研究达三年以上，在促进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特别是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外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

80年代以来，我在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研究，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如江浙）与个案研究（如张謇）。有些中外学者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学者的影响才有此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重视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基础）的研究，而且我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个别的人物与事件。至于说把社会学方法引入辛亥革命史研究，则要感谢我在金大的已故老师马长寿教授。他作为历史学家来讲授社会学课程，自然使我这个历史系学生得到更多的启发，所以对于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概念和方法我早已略有所知。我还要感谢另一位已故老师王绳祖教授，是他在动荡不安的南京为我们开设汤因比史

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所以，当 80 年代国内介绍西方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渐形热潮时，我并不感到十分陌生，而且多少知道有所鉴别。当然，我并非完全否认当代海外知名学者对我的影响，他们对我在信息和资料方面的无私帮助，特别是他们出色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多方面启发，都使我受益匪浅。

不过，我在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作为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这两个特点，实际上都是从 60 年代初研究张謇时即已开始呈现，只不过由于长期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难以充分挥洒而已。80 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拓展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历史研究所的工作领域，我与一批年轻学者先后开始投入中国现代化研究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为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却抱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3

我的人生追求

尽管年轻时曾有种种浪漫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抱负，但却命中注定只能当一辈子教师。不过，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古语云，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我有那么多理解、信任、欢喜我的学生，遍及国内和海外，对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来说，已经足以自慰了。

我对于以豪言壮语装点起来的伟大空话历来非常讨厌，更不满于有些人常常想把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我与楚图南先生素不相识，也从未参观过戴震纪念馆，但却非常欣赏楚老先生为该馆题诗中的两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80 年代以来，我经常以此自勉并勉励自己的学生。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无论在政治压力还是金钱诱惑之下，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优秀的史学是文化瑰宝，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且可以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有些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上受到冷落，甚至还不免受到某些无知的干扰，但历史学者不应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自己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决不止一个，而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和史学家们！

我一向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把他们视为希望之所在。但我从来不敢以人梯自喻，因为我缺乏应有的学术高度，一部分是由于丧失的时间太多和思维的空间有限，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少年失学与勤奋不足。时

下流行的“人梯”之说已失原意，常见平庸之辈也高唱“甘当人梯”，使人未免啼笑皆非。人梯之说大概是由牛顿的名言引申而来，然而牛顿的原话是：“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试问，如果是站在侏儒的肩膀上，难道也能看得比别人更远吗？人云亦云，不求甚解，随波逐流，大抵如此。当然，我并非贬抑一般长者扶掖青年的热情，因为“甘当人梯”毕竟比“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高尚得多，至少是有益无害。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更高的学术标准出发，同时也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人梯”自有严格含义，并非人人可当，正如“大师”、“人师”的称号也非人人都可以领受一样。至于我个人的志愿，无非是甘当铺路石子，让青年学者成长的道路稍为平坦一点，可以比我们前进得更快更远。有一个深夜我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本所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起了若干导引作用。而经过他们不懈的协同努力，便出现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的开辟。这正是我感到聊以自慰之处。

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为了史学的国际化，包括把外国优秀史学介绍进来，把本国优秀史学介绍出去，国际学术交流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1979年开始，我有幸在这方面参与了大量工作，不仅加强了中外史学的交流，而且增加了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至今，我们历史研究所与日本、美国有些著名研究所的交流与友谊已经延续到第三代人了，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有些学术重镇的交流与友谊也正在向中、新生代延伸。同时，在旅居海外期间，我又与外国留学或任教的众多中国年轻学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他们的学业成长与回报祖国多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我离开耶鲁大学时，该校两岸学会的王宏欣同学即席赠诗：“桃李满天下，文章鬼神惊。讲学广会友，寻道每怀情。侃侃谈国事，谆谆励后生。男儿轻聚散，唯愿海河轻。”诗中虽有溢美之语，但其恳挚之情确实使我深受感动。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

总而言之，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卷二 师友杂忆

4

中小学教师

师恩难忘。中小学时代的师恩更加难忘。这是由于儿童和少年可塑性很强，中小学教师比大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大。

我开始进的小学，在武昌胭脂路，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校名那么美好。抗战前，武汉的小学老师都执有教鞭，在课堂上除用以指点地图、板书外，还具有敲讲台乃至“接触”学生肢体的威慑功能。有位姓凤的中年女教师，语文课教得很好，但从来不苟言笑，极为严厉。我由于大字往往写出格线且溅有墨汁，时常有幸蒙受教鞭的关爱。凤老师出手颇重，特别是冬天酷寒，我们上课前都要在课桌边角上把手心摩擦得红通通的，否则冷手挨重鞭其痛更加难熬。但我从不怨恨凤老师，她确实希望我们有所长进，而每次上课眼眶都有两个大黑圈，操劳已使她过早苍老。

1933年回到芜湖，随着哥哥、姐姐进入襄垣小学。记得抗战胜利后我曾旧地重游，看见1937年我们毕业时捐献给母校的纪念亭依然保存完好，碑石上还刻有我们全年级的同学姓名。这所小学当时小有名气，特别是文艺活动出色。可能由于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教导主任程先生则是音乐教师。程主任曾把京剧《蒋干盗书》等折子戏改编成现代歌剧，演员、伴奏完全由学生担任，演周瑜、蒋干的两位主角都是我们同班同学，公演后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这样浓郁的艺术氛围，对儿童性灵的陶冶很有好处。

但对我影响更大的却是张校长。我才进入该校一年，他就因为校内人事纠纷愤而辞职。父亲很敬重他，请到家中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小姑、小叔等一大帮孩子，仿佛是一个新式的家塾。课堂利用我家工厂接待外国工程师的“洋房子”（一座欧式小楼），大家围着长形的大餐桌听他讲课。他就住在楼上，星期六晚上才进城回家。为了表示尊师，每天中午由三哥开诚与我陪同进餐，无非是四菜一汤的家常便饭，冬天则把汤改成火锅。张校长文化素养很好，语文、数学、史地都能教，虽然在我家是客体，但对学生要求甚严。不过他从不打骂，总是温文尔雅地耐心规劝。他最看重的是开诚，据说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有次作文，开诚突有神来之笔，说“时间比欧文斯跑得还快”。欧文斯是30年代美国短跑名将，声誉遍及全球。张校长对开诚的作文非常欣赏，说他摆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套语。此后作文每逢有时间描写，我都沿用“比欧文斯跑得还快”的比喻。张校长对此不以为然，正色告诫说：“外国有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白痴。”我那时还不满十岁，跟着哥哥姐姐勉强读五年级课程，对这个批评感受颇深，开始知道模仿和抄袭都没出息，应该努力自己创造发明。

不久张校长另有高就，于是我又跟着哥哥姐姐，每天沿着漫长的石板路进城，在襄垣小学读六年级。这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大批高校学生南下，或从事抗日救亡，或在南方转学就业，我们小学至少有三位

这样的新老师。其中有位冉先生，北师大毕业，教我们语文课。他出的作文题目都结合现实，如《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之类，爱国救亡的热浪滚滚于课堂内外。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我在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开始时，程主任指挥全体师生高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欢聚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救亡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大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仿佛我们稚嫩的肩膀果真已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担。

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随着辗转西迁的难民潮进入四川。父亲由于薪水微薄，难以养活众多子女，便把我和二姐、二哥送到江津德感坝读国立九中。作为沦陷区学生，既可得到“贷金”维持生活，又可免费继续升学，真是天大的福音。但从此也就与家庭长期隔绝，完全靠学校和老师照管，当然是极为粗放的照管，不可与现时“封闭式”贵族学校同日而语。

德感坝是一个乡下集镇，九中校部就在附近。我先后读过的初一分部、高一分部，却都在更为偏远的山上，借用两座很大的祠堂，另外临时搭建一些简易的竹篱茅舍，就算我们寝室与教室，只能说是聊以避风雨而已。但九中的师资与图书堪称上乘，实验器材也能满足课堂教学需要，这在战时是很少见的。据说安徽大学部分教师内迁四川后无法复校，便降格以求大批转入九中。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陈访先，但他似乎从未来过，实际负责的是副校长邓季宣。邓原先是安徽大学教授，为清代怀宁名书法家邓石如的后裔，曾留学法国专攻哲学，是深受人们尊敬的一位学者。在他的领导下，九中学风严谨而又比较开放，经常请住在重庆或路过江津的学者专家为学生做报告，现在记得姓名的有魏猛克、马丝白等。他对蛰居江津的陈独秀也很尊重，不时过江前往探望这位同乡前辈，陈的儿子松年就在九中管庶务。

在我的记忆中，九中有许多好老师，特别是在高一分部。

有两位语文老师对我影响较深。一位是姚述隐，河北或山东人，颇有慷慨悲歌的燕赵风格，教学深入浅出，讲元曲尤为精采，听课简直成为美的享受。“枯藤老树昏鸦”之类意境，往往使我留连忘返。我对中国文学史稍具常识，多半是得益于姚先生的熏陶。他对我们的作文批改认真，遇有佳句则朱笔圈点，批语亦耐人咀嚼。另一位是朱彤（原名金声），南京人，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当时却已小有名气，曾把《红楼梦》改编成话剧《郁雷》，并且有著名的话剧团在重庆演出，引起不小轰动。但他对我们影响较深的，却是非常注意课外活动，曾带我们去附近的著名诗人吴芳吉故居参观，还去过一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煤矿。我们这些难民学生已经够苦了，但看到那些赤身露体、瘦骨嶙峋的工人，在黑暗且积水的洞穴中匍伏着掘煤或拖煤，有的工人两眼已经失明依然勉强背煤，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简直是人间地狱！朱老师把我对文学的兴趣从古代吸引到现代，并且促使我更加关切与同情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我离开九中以后，朱老师仍然经常与我通信，教我如何读书与做人。

我们还有一位很出色的英语老师赵宝初。安徽人，毕业于南开大学

英语系，已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不像朱老师那样热情奔放，课余与我们也少接触，但课堂教学却是非常投入。他的文化素养较高，知识面很宽，讲课时常能纵横比较，引人入胜。他的讲课仿佛缓缓流动的溪水，时时以知识的清泉滋润我们幼小的心灵。在他的启发下，我热衷于读英、法近代文学作品，增强了对于西方文学史的了解；同时也酷爱做英语语法图解练习，虽在失学失业四处流浪之际仍乐此不疲。我的英语现今勉强可用，应该归功于赵老师诱导有方。赵老师课余爱好京剧，偶尔也唱几句，他的弟弟荣琛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程派青衣。1990年我在普林斯顿见到他的妹妹，据说当时也在德感坝教小学，谈到大哥（宝初）即不胜凄楚，原来已过世多年。

对学生课外活动关心更多的，应数音乐老师瞿安华。他也是怀宁人，瘦削然而精干，可能是由于指挥时习以为常，头总是稍微左偏作倾听状。他不仅把全校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弄得热火朝天，还物色一批有天赋的男女学生组织合唱团，经一段时间强化排练后，正式以四声部演唱赵元任的《海韵》，使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他擅长二胡，常在课余辅导我们学琴，还指导我们做二胡。好在遍山都是竹林，琴杆、琴筒和制弓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蛇皮靠自己捕捉剥制，马尾（做弓弦用）从附近歇息的马屁股上拔。一时间几乎人手一琴，弦歌不绝。刘天华的名曲，诸如《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我都会拉，基本上可以上台演出。可惜弓法习惯已坏，难以进一步提高。抗战时期的农村，连温饱都无保证，何敢奢望广播、电影，只有群众性的自演自唱，为艰苦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与色彩。离开九中后，我与瞿先生毫无联络，但他那火一般的热情使我终生难忘。“文革”后我曾在报上看见上海音乐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二胡演奏的导师就是瞿安华，职称是教授。我想这是他应有的归宿，好人理当平安。

学生时代很爱给老师起绰号，有位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被叫作“老马”，其真实姓名反而早已忘记。他对我们关怀得无微不至，且常以生活经验开导我们。有句口头禅常挂在他嘴边：“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遂以此得名。但我们当时却厌烦这位识途老马的罗嗦，老远看见他便悄悄避开，唯恐被他拉住喋喋不休。半个世纪早已过去了，但“老马”那穿着俭朴的身影，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多年以来，我也常爱向学生喋喋不休，大谈什么人生经验和治学方法，年轻人礼貌地微笑听着，但他们是否也有点厌烦我罗嗦呢？我觉得“老马”的基因似乎已遗传给我了。

九中老师中也有若干对我深恶痛绝，并号召大家“鸣鼓而攻之”者，现在唯一记得其姓氏的是教世界近代史的魏老师。魏老师是山东人，身躯高大，乡音极重，经常穿一身深黄色中山装，颇有军人风度。他非常崇拜俾斯麦，在课堂上大谈这位铁血宰相的文治武功，却又用浓厚的山东口音把俾斯麦念成 Biesmarkai，所以我们背后就称他为“俾斯马凯”。九中本来宁静得像世外桃源，师生安于清贫而专心于教与学。但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加强对学校的控制，连僻处乡野的区区中学也难以幸免。邓校长因遭受诬陷与污辱愤而辞职，教育部把原在八中当校长的邵华调来九中。邵华也是国民党中委，但不像陈访先那样无为而治。他长期住在校部并且带有一批亲信，与当地军、警、宪、特均有联

系。高一分部多次发生学潮，更是他注意防范的目标。我本来是个循规蹈矩用功读书的学生，只是在比我高一年级的若干学生影响下，常为他们的壁报写点散文，偶而也画点漫画。乡下见闻有限，写的画的都是校园内的所见所闻，免不了对校方有所讽喻。但就连这些微笔墨竟也引起某些人注意。1943年春，我已读高三上，“俾斯马凯”时任高一分部训育主任。有天上世界史课，他先不讲正课，却拖长声调宣读我的一篇周记（实际是课外作文）。大意是说一群白鸽在蓝天飞翔，悠扬的鸽铃声惊扰了酣睡者的清梦。这些绅士们怒吼并持竹杆驱赶，但鸽群飞翔与鸽铃悠扬如故。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可能是模仿鲁迅的某篇散文，但丝毫没有讥刺时政之意，何况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国共之争。但魏老师却小题大作，厉声呵斥：“你要自由？什么地方自由？到莫斯科去！”当时我还不满17岁，又昧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对“到莫斯科去”一语的险恶含义毫未察觉。但感到很委屈，因为完全没有这些念头，却又气愤得说不出话来。魏老师号召全班同学揭发批判，但无人应声，只有班长（姓王，以前在学校当过号兵，有20多岁）站起来编造一些情节坐实我确对党国心怀不满。我更愤极语结，当然也毫无认错之意，顿时形成僵局，课堂一片寂静。魏老师似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大手一挥命我坐下，这才开始讲课。课后我冷静下来，恍然大悟祸源出于班长，因为周记一般是经由班长收齐交给班主任的，而兼语文课的班主任平时还常常夸奖我这些模仿鲁迅杂文风格的稚气作文和周记。班长大概是刚发展的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接受了什么特殊任务，因急于表功便把我当成牺牲品，其实平时我是把他当老大哥看待的。课堂风波以后，学校领导并没有找我谈话或立即给以处分，但学期结束时我却接到勒令退学的通知。

事后才知道，邵华认为高一分部乃是九中乱源，主张治乱世，用重典，所以任命“俾斯马凯”这样的铁腕人物当分部训育主任。1943年上半年受处分的不止我一个，上一年级的学生多人被开除甚至被捕，有一人且病死于狱中。

田园牧歌似的中学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然而九中在我心中依然保持着永恒的美好回忆。因为那里留下了我天真无邪的童年和少年的梦。

5

忆黎澍

久仰黎澍大名，但说老实话，早先并不怎么喜欢他的论著。50年代初，常在《学习》杂志上看到他写的一些配合干部学习的理论文章，觉得并无多少新意。特别是他写过一篇批评侯外庐文字艰涩的短文，给我留下对长者过于苛求的轻慢印象。

但1961年初夏的首次面谈，迅速改变了我的看法。当时我受湖北省社联的委托，为筹备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到北京与学术界联络，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住在东厂胡同1号近代史研究所，由该所学术秘书刘桂五负责接待。有天桂五说：“你应该见见黎澍，他是我们的新任副所长，是为了加强近史所的领导派来的。”经由他的安排，我

按约定时间前往拜会。黎澍工作虽已变动，但暂时仍住中宣部。我第一次走进这样高层的大机关，心情有点紧张，又不认识路。正在为难之际，有一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找谁。我说找黎澍，她笑着说：“跟我走吧！”于是把我带进一间很大很大的办公室，只见一位矮胖且已秃顶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那情景使我感到很像电影里的列宁。中年妇女轻声说：“有客人来了”，便走进内室，事后我才知道这就是黎澍夫人。黎澍让我坐下，随即滔滔不绝讲起来。他好像事先对我的来意已有所了解，所以谈话颇有针对性。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双百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他反反复复地解释，还怕我理解不深，便打比喻说：“如果一百株花都是一样形状，一样颜色，好看吗？又好比一百只鸟，叫起来都是一种声音，好听吗？”看见我点点头，他才满意地笑了。接着说：“现在学风不好，尽讲空话，空头理论，范老要在《历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反对放空炮》。中央现在提倡实事求是，你们要开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正好可以借此改进学风。”他还问我准备提交什么论文，我说是结合辛亥革命史实探讨民族资产阶级性格。他对此未加可否，只是强调一定要有大量史料，从历史实际出发，并劝我不必参加当时颇为热络的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争论，切切实实做自己研究。

我在青少年时代性格比较内向，很少主动与外界联络，加以自幼即离开家庭，可说是不通人情世故，连一些日常应酬礼仪都不大懂。但见了黎澍之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加不讲客套的人，这就增添了我对他的亲近感。1961年10月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吴老（玉章）致开幕词，其内容与此前黎澍对我强调的两点大体相同，原来这篇开幕词就是他起草的。会议期间，他还为年轻学者做了报告，特别强调学习中西哲学以丰富思想的必要，这也对我此后的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1963年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借调，我到北京参与北洋军阀史料征集工作，随后又参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并未具体过问筹建事务，因为正在主持批驳苏联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种种言论。在此期间，我与他只是偶尔在开会时见面，别无任何私人之间交往。但在其后的漫长灾难岁月中，我们却都沦落为史学界的批判对象，尽管我们原来的地位大为悬隔。因为，历来的政治运动，在学术界也培养出一批“侦破里手”，他们不仅善于“上纲上线”，对别人文章“鸡蛋里挑骨头”；而且善于“上挂下连”，编织种种“黑线”、“黑网”。就连我与黎澍这样平淡的关系，也曾被人追寻其中的“线网”踪迹。

1964年秋天，我不满于戚本禹评论李秀成文章的武断专横，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的争鸣文章，却不料立即横遭无休无止的粗暴批判。这篇文章是我自己有感而发，而且是在一个夜晚匆匆写成，事先并未与任何人商量过。可是“侦破里手”们却不满足于对我个人的批判，偏偏要“顺藤摸瓜”，追查我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动机。“文革”期间，在批判我为叛徒李秀成辩护的一次会上，有人揭发说，1963年秋天近代史研究所曾召开过讨论戚本禹文章的座谈会，黎澍在邀请与会名单上特地增添祁龙威与我的名字。可见我“抛出那株大毒草”决非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云云。真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幸亏那天我正好有别的事情，确实未曾参加近史所这次会，使“侦破里手”们的追踪又一次扑空。

我与黎澍的再次见面已是在十年以后，即1975年暑假，我们都去哈尔滨参加一次有关中俄边界史的讨论会。会议的具体内容早已记忆模糊，倒是众多师友在历经磨难之后的重新相晤，其情景的热烈至今印象犹深。黎澍当时还比较谨言慎行，因为“四人帮”仍然把他视为敌对势力，所以借口牙疼没有在大会发言。我曾借用列宁的话开玩笑，说他恨不得把痛牙与修正主义一并吞下去。他却感慨地说：“以前有能力到处跑，却只愿呆在北京；现在很想到各处走走，却已是力不从心了。”其实他当时才62岁，除血压偏高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会后他提议到边境看看，由丁名楠、陈铁健和我伴随。原想沿大兴安岭作边境考察，因当时中俄关系正趋紧张而作罢，改为到镜泊湖参观。镜泊湖原先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以水平如镜得名，为重重叠叠的山峰与森林环绕。50年代曾经作为苏联专家的休假别墅，因此没有高楼大厦，都是一座一座造型各异的俄罗斯风格的木屋，与自然景观十分协调。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这里改作中央领导人休养之地，但除刘少奇夫妇以外，其他几位高层领导似乎都未曾来过。“文革”期间此地已成被遗忘的角落，连道路和木桥都破损不堪，只有一个管理员、一个厨师和两个女服务员（由牡丹江市北山宾馆轮流派往）象征性地照管。当晚我们住在刘少奇夫妇住过的一座木屋，倒也宽敞、清洁、舒适，据说黎澍睡的就是刘氏夫妇的卧室。客厅墙上有大幅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招贴画，可能是表示以正压邪，也可能是管理人员用以应付造反派，避免无谓的损坏。晚间出外散步，只见无边无际的浓密森林，一片黑幽幽的阴影，偶尔有点点绿光闪烁，女服务员说是虎狼的眼睛，吓得我们毛骨悚然。不过湖水确实清静，在月光下泛出银光，我们忍不住下水游泳，因为浴室已无自来水供应。这一晚，偌大的山庄只有我们十个人（连同工作人员与陪同人员）住宿，分别住在三座木屋中，其余的房屋都是一片黑暗。次日黎明，鸟声悦耳，松鼠不时跳到窗台上，人与自然的距离顿时缩短。我与老丁出外散步，发现有的空房走廊上竟有新鲜的野兽粪便，想必昨晚定有“不速之客”光临。黎澍在整个行程中都兴致颇高，谈笑风生，偶尔还喝一杯白酒助兴。临别时，山庄工作人员一定要与“中央首长”合影留念，我们不敢招摇撞骗，但他们硬是不依，强拉我们合照了一张相，那老厨师还激动得紧紧与我们握手。我们事后开玩笑说，一定是黎澍太像中央首长了，否则不会有此误会。黎澍则认为，大概过去每次中央首长来此都照例要合影留念，在冷落多年之后，幸而有我们光顾，虽明知不属高层领导，总算聊胜于无吧。那时邓小平还在中央主持工作，大刀阔斧的整顿颇见成效，我们对前途怀有相当信心，没有想到一股新的反动逆流正在暗中酝酿，其中也包括对黎澍的再次冲击。

“四人帮”垮台以后，黎澍精神振奋，思想活跃，除批判“影射史学”外，还率先突破禁区，就历史动力等重大问题勇敢提出独立见解，对史学革新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也因此更加尊敬他、信任他，愿意向他寻求指点与支持。1978年春天筹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他欣然答应担任顾问，并建议一定要加上“中南地区”的限定。他认为中国太大，人际关系由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而更加复杂，办全国性的大学会难处很

多，不如办人员精干的小学会反而易见成效。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会一直坚持人员精干、团结务实的优良作风，为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与黎澍的正确建议是分不开的。

黎澍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在各个领域成为主要骨干。他对我们期望更殷，要求更高，谈话也更深切。记得在中国史学会重建开成立大会期间，他对某些高论颇为不满，悄悄对我说：“有的人总想以史学领域党的代言人自居，你能代表党吗？史学是党的宣传工具吗？这不仅是玷污史学，也是玷污党！”会间休息时，他又走过来对我说：“我们都赞成说真话，但说真话是有可能杀头的哟！”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犹如暮鼓晨钟时时发我深省。此后我们多次在各地学术会议中见面，他都是兴致勃勃，论古道今。尽管其处境已经不甚佳妙，但仍然对个人、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甚至对于自己的健康，他也充满信心。有次桂五笑着对我说：“黎澍的体检情况最好，下水（内脏之谑称）全没病。”大家都为此感到欣慰。他也显得精力充沛，光采照人，全无老迈迹象。所以连日本同行学者也称之为“湖南血性男儿”，请他到东京浅草喧闹的小酒店里放大嗓门高谈阔论。

我确实没有想到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会那么迅速离开人间。我不仅为中国学术界惋惜，也为自己惋惜。他是当代中国学人中思想最为丰富、气象最为宏大者之一，属于能开风气的宗师。我与他有那么多接触机会，却未能抓紧向他多多请教，而由于我的疏懒，平时也没有什么书信往来。记得有次他在《辛亥革命史丛刊》上看到沈渭滨写的一篇有关早年孙中山的文章，对其中若干问题甚感兴趣，曾写信给我打听作者地址，但就连这唯一的来信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当黎澍夫人为他编辑文集向我征求函札时，我竟无以为应，内心倍增愧疚。现在更为年轻一代的学人对黎澍大多已不甚了了，但我认为他对史学革新的开风气之功是不会湮没的。他那追求真理的勇气，对史学理论探索的执著，以及对人的肝胆相照、真率热忱，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

忆东老

在湖南澧陵当代杰出人士中，有两位与我关系较深，一是黎澍，一是杨东莼，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东老。

东老是中国有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以翻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享誉于进步学术界。他在政治上经历的风风雨雨，现今已经鲜为人知，倒是在教育方面的多年劳绩永远遗爱人间。

初次认识东老是在1954年。那时我已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他则刚从广西大学奉调来汉任我院院长。东老的到来使全院师生大为振奋，因为此前数年武汉高校工作颇受左倾思潮干扰。不仅是对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而且还沿用过去办革命大学（实即党校）的方法来办正规大学，因此很难实现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中共中央与中南局对此已有察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改进，调杨东莼出任华师院长，正是这些重要举措之一。记得中南教育局副局长孟夫唐代表中南局和中